

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李 闯 谢禾逸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大学生群体的体育锻炼时长及其影响因素,特别关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就读大学类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大学生,其体育锻炼时长反而越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只会对相同学校类型的大学生群体的体育锻炼时长发挥正向影响。由此,建议在缓解学业压力的基础上,鼓励大学生群体,尤其是重点高校学生群体参与体育锻炼。同时,需要充分考虑大学生的性别差异,推动高校体育赛事和体育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提升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

【关键词】大学生 体育锻炼时长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3.06.008

一、问题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调研时,特别强调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理念^[1]。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提倡“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2]。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的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要让孩子们跑起来”^[3]。“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4]。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体育锻炼情况和健康状态与国家的“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目标密切相关。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应不少于一小时。然

收稿日期:2023-09-13

作者简介:李 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文化社会学与体育社会学;

谢禾逸,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本科生,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生代体育亚文化中的代际秩序、文化结构与社会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3BSH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而研究表明,国内仅有19.7%的儿童和青少年(其中男孩占21.6%,女孩占17.6%)能够达到建议的每日体育活动标准。同时,超过四分之三的青少年日常久坐时间超过2个小时^[5]。截至2020年,我国7岁以上人口中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比例仅为37.2%,远低于国际水平^[6]。2023年,一项针对全国25125名大学生体育锻炼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群体中有近一半学生每周运动不足三次^[7]。

近年来,一些政策的出台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的重视,也反映出关注青年运动的特点及培养体育爱好的必要性^[8]。那么如何增加大学生群体的体育锻炼时长从而提升其身心健康水平呢?结合以往研究,本文认为,分析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因素是十分必要的。

体育锻炼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其理论植根于文化社会学的诸多研究中^[9]。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针对大学生群体体育参与状况的实证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既有研究缺乏对大学生群体体育锻炼时长影响因素的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使用2021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PSCUS)数据,聚焦于大学生群体体育锻炼时长及其影响因素,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就读大学类型的作用展开研究。

二、文献梳理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群体体育锻炼

在社会学领域,布迪厄关于体育与社会阶层^[10]的研究被认为是将体育作为一个社会学议题的重要标志性成果。布迪厄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关注于解释现代社会的再生产机制。在他看来,体育就像艺术一样,反映了经济和文化资本的持有情况,从而有助于构成象征性的区别化生活方式。他认为体育既可被视为一种文化机构,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过程和文化实践的形式,这种观点把体育置于社会文化生活研究的核心位置。在《区分:判断力的自我批判》中,他首次介绍了基于阶层的习性概念,即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有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和身体特质。身体特质是阶层地位表现、认可和展演的方式,同时也与文化资本、惯习、场域等概念紧密相连,成为了解社会阶层差异的关键因素。

在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时,文化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普遍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民众往往拥有更长的体育锻炼时长。体育活动不仅是一种反映社会阶层区隔的惯习定势(Dispositions of the Habitus),同时也是阶层区隔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体育锻炼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重视程度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差异。身体成为阶层差异的显著标志,借助劳动和体育锻炼等社会过程展现,成为阶层流动的关键策略之一^[11]。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成长期间所接触的体育生活方式,对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少年身体训练和塑造有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往往对青少年未来的成长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民众对体育锻炼的重视还与体育锻炼本身的积极效用有关。例如,体育对于提升青年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体育活动通过改善学生的认

知功能可以起到帮助学生提升学业成绩的作用^[12]。也有学者发现,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提升其亲情质量、友情数量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进而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产生影响^[13]。增加体育锻炼时间还可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增强调适能力^[14],强化社会信任和参与度。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健身活动更灵活更个性化,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融合使得健身超越了单纯的体育锻炼,成为大学生自我展示、社交互动及生活习惯构建的关键组成部分^[15]。因此,健身在大学生体育锻炼中的角色日益重要。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a: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成正比。

近期,“内卷”一词走红网络,泛指具有“过度竞争”特征的社会现象。内卷是一种固化形态,反映了人们不断努力却难以取得预期结果,导致人们在竞争的大潮下产生不进反退的无力感和自我认同感的缺失。这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转型调整转变之际,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增强。这种背景促使人们在争夺有限的高质量资源时陷入了剧烈的内部竞争。网络媒体和文化隔阂进一步加剧了与社会流动相关的焦虑^[16]。

黄宗智将此概念应用于中国华北小型家庭农场,关注内卷化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17]。“内卷化”这一概念在我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在2020年,一张关于某知名学府学子边骑车边使用电脑的照片引爆网络,使这一词汇一举跃升成为2020年度十大流行词之一^[18],也引发了学术界的 research 热潮。

社会对“内卷化”的关注反映出人们对于资源和机会有限的担忧,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转向增长放缓的过渡期^[19]。因此,随着人们加入那些上升机会有限的竞争,个体单位投入可以获得的边际报酬递减,导致个体需要不断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竞争。早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过多地参与体育锻炼可能不利于那些出身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的青少年群体的学业表现^[20-21]。近年来,国内中产阶层家长开始认为体育是体现阶层品味的重要手段。体育锻炼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群体中意义不同,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来说,减少体育锻炼时间成为追求学业成功的一种策略。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b: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成反比。

(二) 大学类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体育锻炼

此外,本研究还关注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就读于不同大学类型的大学生群体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大学生群体职业获得的关键^[22]。名校毕业是大学生群体毕业以后拥有一份稳定和高收入工作的保障,同时也是大学生群体“内卷”程度的主要表现^[23]。个体升学时面临的评价体系较为单一,更多指向包括绩点和科研成果在内的学业成就,由于时间精力有限,当大学生群体面临内卷化竞争时,他们的体育锻炼的时间将减少,产生挤出效应^[24]。但由于参与机会竞争的意愿强度不同,大学生在获得学业成就等领域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同,体育锻炼时间的挤出效应也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在重点学校中资源争夺更为激烈,学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学业成就的内卷化竞争中,难以兼顾体育锻炼。

此外,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锻炼时长的影响还与父母的教育期望有关。社会分层领域中的布劳—邓肯模型指出了人们的教育获得与其父辈的社会阶层特征和教育水平显著相关^[25],其作用机制之一是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父母,对其子女有更高的教育期望^[26]。可见,大学生群体就读大学类型是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育锻炼时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变量。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拟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因其就读大学类型的不同而不同。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21年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该项目旨在通过长期调查,对我国大学生生活、就业、价值观变迁进行实证研究。本调查将中国大陆地区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作为总抽样框,依照多阶段、分层等概率的抽样原则进行取样。具体说来,项目将学校层级作为第一层抽样单元,将学科专业作为第二层抽样单元,将班级作为第三层抽样单元。抽样的第一阶段,将中国大陆地区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按照学校层级、学科类型和分布地域的不同,划分为3个抽样层进行抽样。抽样的第二阶段,在入样的学校中,每所学校随机抽取8个专业。抽样的第三阶段,在入样的专业中,每个专业每个年级随机抽取1个班,25名学生入样。原则上如果班级规模不超过30人,则班级学生全部入样。如果班级学生规模超过30人,则利用随机数表的方法抽取25名学生入样。该数据库提供了丰富的大学生个体信息,是了解中国大学生群体生活、就业、价值观变迁的理想数据库^[27]。

(二)变量测量

本文关注的因变量是大学生群体的体育锻炼时长。“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询问了大学生群体平均每天锻炼时长的情况。题目选项从0-10小时以上,由于每天平均锻炼时长为5小时以上的情况极少,本文因变量的取值为0-5小时的连续变量。

本文的主要自变量是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变量。具体而言,本文使用了大学生群体的家庭月收入 and 父辈受教育程度衡量其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父辈受教育程度采用父亲受教育程度进行测量,它是一个序列变量,包括两类:大学(包括大专)及以上和大学(包括大专)以下。家庭月收入根据大学生对父母税后月收入估计的金额进行测量,本文使用的是家庭月收入对数。此外,我们还关注了不同层次学校大学生群体体育锻炼时长的差异。此外,有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个体就读大学的层次越高,其拥有一份稳定和高收入工作的可能性就越高^[28]。因此,本文将大学生就读大学类型分为三类:一是高职院校;二是普通高校;三是重点高校。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籍等。性别变量以男性作为参照项。年龄作为连续变量。户籍分为农村户籍和城市户籍两类,以农村户籍为参照项。表1呈现了本文主要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连续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体育锻炼时长(单位:小时)	0.95	0.85	0	5
年龄	19.60	1.27	16	24
家庭月收入(对数)	8.54	1.41	0	11.51
类别变量		百分比		
女性(参照组:男性)			54%	
城市户籍(参照组:非城市户籍)			0.38%	
父亲受教育程度 (参照组:大学以下)			0.23%	
	高职院校		48%	
就读大学类型	普通本科		15%	
	211、985 高等院校		37%	

四、研究发现

(一)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Ordinary Least Square Regression)分析了大学生群体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大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其体育锻炼时长,以检验研究假设 1a 和研究假设 1b。研究使用双尾检验以判断零假设是否成立,并检验研究假设。

表2 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及其解释贡献率

	模型 1	解释贡献率
女性(参照项:男性)	- 0.269*** (0.014)	31.11%
年龄	- 0.011* (0.006)	0.84%
城市户籍(参照项:农村)	- 0.013 (0.019)	5.79%
父亲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大学以下)	- 0.002 (0.022)	6.26%

(续表)

	模型1	解释贡献率
家庭月收入(对数)	-0.013** (0.005)	2.74%
就读大学类型(参照项: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262*** (0.021)	53.27%
重点高校(211/985高校)	-0.419*** (0.019)	
常数项	1.619*** (0.122)	
观测值数	12 928	
R ²	0.082	

注:*** p<0.001, ** p<0.05, * p<0.1 (双尾检验);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

表2结果显示,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并不能显著影响大学生群体的体育锻炼时长,然而在控制其他个体特征变量后,家庭收入越高的大学生群体,其体育锻炼时长越短。这与我们研究假设1a冲突,但与研究假设1b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呈反比”一致。这说明,内卷化假设是解释当前大学生体育锻炼与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重要解释机制。换言之,在学历贬值、社会内卷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面临的父母以及社会的期望也就越高。由此,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体育锻炼时长。

此外,有关大学生就读大学类型的主效果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内卷化压力背景下,出身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大学生群体,其体育锻炼时长更短。具体而言,表2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高职院校就读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长最长,其次为普通高校大学生,重点高校就读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长最短。

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变量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解释力,本文借鉴已有研究^[29],在表2模型1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计算了不同变量的夏普利(Shapley)分解值,得到了不同变量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解释贡献率。表2结果显示,代表大学生群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对数的总解释贡献率为9%。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就读大学类型对其体育锻炼时长的解释贡献率最高,为53.27%。这再次说明了内卷化压力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性别也是影响大学生群体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女性大学生群体更加倾向于非体育锻炼类的休闲娱乐活动。

(二)就读大学类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

表3呈现了不同类型高校中,大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体育锻炼时长影响的差异。模型1为父亲受教育程度与大学生就读大学类型的交互作用模型,模型2则呈现了家庭月收入对数与大学生就读大学类型的交互作用。

表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类型大学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分析

	模型1	模型2
女性(参照项:男性)	-0.271*** (0.014)	-0.271*** (0.014)
年龄	-0.011* (0.006)	-0.011** (0.006)
城市户籍(参照项:农村)	-0.013 (0.019)	-0.013 (0.019)
父亲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大学以下)	-0.138*** (0.050)	-0.007 (0.022)
家庭月收入(对数)	-0.014** (0.005)	-0.021*** (0.008)
就读大学类型(参照项: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270*** (0.023)	-0.058 (0.146)
重点高校(211/985高校)	-0.439*** (0.020)	-0.647*** (0.101)
父亲受教育程度(参照项:大学以下)*就读大学类型(参照项: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143** (0.070)	
重点高校(211/985高校)	0.166*** (0.054)	
家庭月收入(对数)*就读大学类型(参照项:高职院校)		
普通高校		-0.024 (0.017)
重点高校(211/985高校)		0.026** (0.012)
常数项	1.631*** (0.122)	1.696*** (0.131)
观测值数	12928	12928
R ²	0.082	0.083

注:*** p<0.001, ** p<0.05, * p<0.1 (双尾检验);括号内数字是标准误。

与上文一致,此处也使用双尾检验以判断零假设是否成立,以检验研究假设。表3显示,在相同类型高校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积极作用仍然存在。这证明了我们的研究假设2,即就读高校类型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体育学和教育学领域关于体育锻炼的研究通常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体育锻炼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30]。然而,在社会学视角下,对这一结论的探讨揭示了其中的复杂性。针对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社会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发现,体育锻炼的参与程度与学业成绩可能存在负相关,特别是对于那些来自较弱家庭背景的学生而言^[31]。

在不同教育环境中,对于布迪厄在其文化社会学理论中提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体育锻炼正相关的普遍假设仍有讨论的空间。在社会学领域,对该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未建立起全面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基础。研究表明,在我国,优势家庭背景的学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在课外补习上,从而获得比弱势家庭背景学生更优秀的学业表现^[32]。数据表明,特别是在重点高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往往由于学业竞争和内卷化的压力,减少了体育锻炼时间。西方的传统教育学和社会学理论认为,家庭背景和体育锻炼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因为我国有重视文化学习的传统,导致我国青少年在学习成绩上的内卷化程度相对较高^[33]。绝大多数学校都更为重视学生的学业表现而忽视体育锻炼的重要性^[34],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尤为如此,导致家庭背景和体育锻炼时长出现了负相关的关系。

我国教育内卷化的现象可能是导致大学生体育锻炼不足,乃至亚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35]。这与先前研究中关于家庭背景与习惯之间关系的结论一致。在我国,阶层文化分层的主要表现局限于与经济资本直接相关的消费领域,与西方社会相比,尚未形成由文化资本传递导致的阶层间品味和惯习上的明显分化^[36]。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社会学视角,本研究分析了当前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群体的体育锻炼时长的影响因素。研究目的在于为我国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和身体健康发展提供基于实证经验的支持和对策建议。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较高的家庭经济条件并未直接导致更多的体育锻炼资源和机会,反而可能因为学业竞争的压力而减少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与欧美国家基于相似数据的研究结果不同,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学生更倾向于将精力集中于学业竞争,而不是体育锻炼。在我国,体育锻炼作为阶层流动的策略并未得到广泛认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体育职业化程度较低且家庭比较重视学业成绩。

另一方面,尽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并未在全面提升大学生体育锻炼程度上发挥普遍的积极作用,但本研究还发现,在相似的内卷环境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积极作用依然存在。具体而言,无论是在重点高校还是在普通高校就读的大学生群体,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长可能更长。这表明在特定条件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仍然可以成为推动

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这一结果突显了经济资源在体育教育中的双重作用,并揭示了社会经济差异可能对体育活动参与造成的差异。

本研究还关注了就读大学类型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时长的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就读于重点高校的学生相比普通高校的学生,体育锻炼时长显著减少,这可能与重点高校中更激烈的学习竞争和更高的学业压力有关。此外,性别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女性大学生更倾向于非体育休闲活动,这可能与传统性别角色和文化期望相关。有研究表明,女性学生在学业成绩上往往优于男性学生,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女性学生更倾向于投入更多时间用于学习^[37]。因此,在推广体育锻炼时应考虑性别差异,并采用包容多元的策略。

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宏观层面上的行动应包括对大学生及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负担进行全面评估,以制定更加精准的对策措施。其中,重点要减轻学生的学业压力,对此进行此评估时,应充分考量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性别及所在高校类型等多方面因素。其次,针对体教融合政策的规划,应围绕不同类型的大学生群体,制定具体举措。确保性别和高校类型不同的大学生都能享有平等的体育锻炼机会。同时,探索如何减轻学业压力,使学生能够在学业与体育锻炼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最后,体育产业的发展程度是影响全国大学生体育教育投入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大力发展体育服务业,如推动大学体育赛事的发展、促进体育服务产业的升级迭代等。这一举措不仅是推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强青少年体质和促进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

[参 考 文 献]

- [1]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习近平的小康故事)——习近平同少年儿童的故事》, <http://qh.people.com.cn/n2/2021/0710/c182753-34814229.html>
- [2] 《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57.htm
- [3] 《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增添新动力开创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坚定信心提振干劲》, 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23/content_5546498.htm
- [4] 《【每日一习话】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808/c1001-32497461.html>
- [5] Liu, C.. Promoting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Chinese Youth: No Time to Wait, *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 2017, (2).
- [6] 钟华梅 王兆红:《我国大陆居民体育锻炼参与决策及体育锻炼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载《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3期。
- [7] 《近五成大学生每周运动不足三次》, http://news.cyol.com/gb/articles/2023-08/21/content_NVEv17h8WE.html
- [8] 鲍明晓:《新发展格局下体育发展的新理念、新动能、新模式、新机制研究》,载《体育科学》,2022年第1期。
- [9] 孙睿谄 陶双宾:《身体的征用——一项关于体育与现代性的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 [10] Bourdieu, P.. Sport and Social Clas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1978, (6).
- [11] 希林·克里斯:《身体与社会理论》,李 康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04、210页。
- [12] 成 刚 陈 瑾 姚 政:《体质健康水平如何影响学业成绩》,载《教育学术月刊》,2021年第3期。
- [13] 周 威 刘 杰:《体育锻炼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差异及路径分析——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10期。

- [14] 柳建坤 何晓斌 张云亮:《体育锻炼、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载《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5期。
- [15] 唐 军 谢子龙:《移动互联时代的规训与区分——对健身实践的社会学考察》,载《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1期。
- [16] 曹云鹤 陈友华:《内卷:流行根源与社会后果》,载《人文杂志》,2023年第1期。
- [17] Geertz, C.. *Agricultural Involvement: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80 – 81.
- [18] 《〈咬文嚼字〉公布2020年度十大流行词》,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K40NveEH9B7nyFO7N4rjZleRvdJxGosLub8-tPQRV96fhvdygvo39xSjXEHDuIM5xlV7vauZ_XsISKn8tU36Feml37HrGZ5dDEAyuZOCrom&wd=&eqid=89ebea4500023f59000000-03655a53eb
- [19] 李春玲:《社会经济变迁中的Z世代青年:构成、观念与行为》,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
- [20] Willis, P. *Learning to Labour*, Farnborough: Saxon House, 1977, pp.152 – 156.
- [21] Carrington, B.. *Sport as a Side-track. An Analysis of West Indian Involvement in Extra-curricular Sport*. In Barton, L., Walker, S. (eds.), *Race, Class and Educ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2, pp.221 – 225.
- [22] 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3期。
- [23] 龚 顺:《中国大学生对美日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载《青年研究》,2020年第1期。
- [24] 马天平 卢旭蕊:《时间挤出、收入促进与参与型体育消费》,载《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
- [25] 周 怡:《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 [26] 刘保中 张月云 李建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教育期望:父母参与的中介作用》,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年第3期。
- [27] 李春玲:《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载《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28] 龚 顺 叶茂鑫:《新冠肺炎疫情与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载《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 [29] 秦广强:《群际差异视角下的政府工作满意度研究:2005年与2015年比较》,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 [30] Muñoz-Bullón, F., Sanchez-Bueno, M. J., Vos-Saz, A.. *The Influence of Sports Participation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mong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Sport Management Review*, 2017, (4).
- [31] David, J.. *Race,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Educational Effects of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2, (2).
- [32] 李佳丽 何瑞珠:《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和青少年发展: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阐释》,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8期。
- [33] 徐 靖 陶文泰:《家庭教育的三阶期望:家庭、社会和法律》,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3年第2期。
- [34] 柳建坤 赖世文 张云亮:《青年体育锻炼的社会分层研究》,载《青年研究》,2023年第5期。
- [35] 林扬千:《精疲力竭的突围:大学生内卷化现象的表现、危害及应对》,载《当代青年研究》,2021年第3期。
- [36] 洪岩璧 赵延东:《从资本到惯习:中国城市家庭教育模式的阶层分化》,载《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 [37] 文东茅:《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学业及就业的性别比较》,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

(责任编辑:刘彦)